

嵇康“越名教”之我见

□王世宇 张健

(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, 辽宁 朝阳 122000)

摘要: 嵇康提出“越名教”而任自然, 其本意是想通过对世俗的“释”、“忘”来实现一种身心的解脱, 进而抵达人生的化境, 然而在实践中却唯“情”所向, 将之变成了与世俗和政权的对抗。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因此也就沦为前后矛盾的“假言”。

关键词: 超越; 对抗

[中图分类号] B235.3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3-6547 (2008) 02-0145-02

魏士人嵇康(224-263), 慨“名教”之伪善, 慕老庄之无为, 于魏晋之际, 首提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 并认真践行, 不惜生命, 为后世留下了绝代风采。今人探究嵇康, 如论及其思想, 也多从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这句名言去窥探他的心灵世界, 俨然把这句话视为开启嵇康心理世界的方便之门。但是多年来, 人们多把注意力放在了嵇康“任自然”一语及其所体现的“自然”观上了, 而对“越名教”的研究却不是很多。笔者认为, 嵇康对“越名教”的理解和实践从根本上关乎其“自然”观的实现, 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。

一、“越名教”的提出

“名教”一词语源不详, 陈寅恪先生据王弼对老子“始制有名”的注语加以推论为: “以名释教, 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, 乃入世求仕者所以宜奉行者也。”晋人袁宏(328-376)说: “夫君臣父子, 名教之本也。”^[1]以孝悌观念为基准的君臣父子的礼制自汉武帝纳董仲舒之“罢黜百家, 独尊儒术”的建议后, 随王权政治的发展而逐渐达于极盛, 尤其在东汉光武帝设“国教”、章帝“撰定国宪”后, 完成了儒家礼教为国家最高法典的地位。孝悌观念从而也就一改原始儒家的温情脉脉, 成为一种王政的训诫, “名教”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下对“伦理纲常”的一种强化, 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儒家教化的异变。汉末以来, 经学没落, 大一统政权的崩溃, 伴随士之个体意识觉醒及玄学的产生, “名教”日益遭到了广大士人的反对和批判。

嵇康诗文一共两次提及“越名教”, 皆出自《释私论》:

矜尚不存乎心, 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; ……越名任心, 故是非无措也。

“越名”即“越名教”一语的简化。何谓“越名教”? 我们的理解就是要“超越”伦理道德的束缚。那么如何去“超越”呢? 嵇康说“矜尚不存乎心”就能做到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“矜尚”意崇尚自尊自大,^[2]“矜尚不存乎心”也就是说心中不存世间的名闻利诱, 即《释私论》后面所言的不是其是, 不非其非, 成就君子品格, 要释怀私欲、大公其心。然而, 这非“气静神虚者”所不能为。“气静

神虚”, 显然指修炼老庄“自然”之道。^[3]那么通过这些探讨, 我们便可以给嵇康之“越名教”做一个注解了, “越”即以“自然”为旨归, 释私忘欲; 而“越名教”, 就是要通过这种对世俗的“释”、“忘”来实现一种身心的解脱。如其言“弃智遗身, 寂乎无累”。(《赠兄秀才公穆入军诗》之十八)

二、嵇康的“超越”观

经学思想及“名教”统治自问世以来就给广大士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, 所以自东汉以来, 就有很多智识之士在探索这种困境的解脱。选择不仕、隐居求仙是当时很多人的做法。其实, 解脱身心, 期于“无累”, 并非一定要远遁江湖, 人可以不离红尘却又远离世俗, 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, 嵇康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。“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, 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生境界”, 罗宗强先生说, “嵇康的意义, 就在于……把它从哲学的境界, 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, 把它由道的境界, 变成了诗的境界。”^[4]

那么嵇康是如何将哲学变为实有, 变道境为诗境的呢? 嵇康在其诗文中也多次提到这样一个字: “忘”。

但同样是“忘”, 庄子之“忘”似乎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, 而嵇康之“忘”似乎带有一种人间的企盼。王国维言诗境“有我之境, 无我之境”。庄子一觉醒来“不知周”, 不知蝴蝶是我, 还是我是蝴蝶,^[5]应是“无我”之境; 而嵇康“慷慨以忘归”, 前面又是一番感“悟”、景“仰”和“羡慕”(见前所引《琴赋》), 有雕琢的痕迹, 显然属“有我”之列。王国维说: “古人为词, 写有我之境者为多, 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, 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而。”^[6]从静安先生“然未始不能”的语气及对“豪杰之士”的态度来判断, 体味“无我”之境显然是要难于“有我”之境的。对嵇康而言, 虽然谁也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豪杰地位, 然从其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“境界”看, 比之庄子, 对世俗的“超越”则在下矣。

不去计较, 就真能“忘”吗? 嵇康的思想似乎存在隐患。

三、嵇康的“超越”实践

就像他憧憬和描述的那样, 对世俗“名教”, 嵇康果真

不去“计较”了吗？事实上，好像并非如此。

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“嵇康”条载“谯郡嵇康……好言老、庄，而尚奇任侠。至景元中，坐事诛。”颜之推告诫子孙：“嵇叔夜排俗取祸”、“傲物受刑”、“凌物终凶”，^[7]至于其中说法是否合理，我们暂不讨论，但就界定其“排俗”、“傲物”、“凌物”倒也是实情。如嘲讽名士钟会“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”^[8]嵇康难道一定要通过嘲讽钟会来实现一种自我标榜，从而确立个人的价值吗？事实上，嵇康主观意识里没有这种设计，他只不过是耐不住自己的性子而已。嵇康追求释忘，却沉陷在一种机械的“自然”体会里，沉陷在另一种形式的世俗中，为俗所累。

虽言曰“越名教”，但事实上，嵇康终其一生都在与“名教”对抗。对不合己意之人事，嵇康不是轻蔑、否定，就是打击、嘲讽，且形成一贯的做法。其诗歌里也常常流露出批判的言行，不仅对政治，就是对一般世俗也予以同样的态度。

“齐万物兮超自得，委性命兮任去留”。（《琴赋》）从这类诗文，不难看出，嵇康的本意是要超越“名教”取道“无为”而向“自然”的。此句本可以成为是嵇康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最形象的注释。“委性命兮任去留”可谓是嵇康“任自然”的生动写照，可惜的是，用“齐万物兮超自得”来诠释嵇康的“越名教”则十分不恰。嵇康言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但实际上他只做到了后半，而前半在后来也基本上被后半掩盖或者说是抹煞了。

四、嵇康“超越”观的本质分析

本意在体认“自然”，通过释忘“名教”世俗，转入人生化境，但是结果却是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嵇康无意于政治，一生都没表现出这方面的愿望，甚至一心要“任自然”的，又何以招致罹祸？问题是出在“越名教”思想观念吗？阮籍哭丧兵家女、醉卧美妇旁、母孝吃酒肉、白眼礼俗人，违情越礼较之嵇康无过之而不及，然司马昭还为之圆场，说“嗣宗毁顿如此，君不能共忧之，何谓？”^[9]皇甫谧也不与世俗为偶、屡诏不就，司马炎却体谅他“与流俗异趣”，^[10]亦得善终。由此可见，“越名教”并不是致人于死地的原因，按照鲁迅的说法，即便是司马氏也不是真正崇信礼教的。^[11]

其实，问题就出现在对“越名教”的辨别和实施上。首先，“超越”不是将对象打死，而是舍弃。就“名教”而言，它需要在世事的辨明中遗其繁富、就其简约，理顺关系、找到出入之窍门。嵇康虽然提出了“越”的概念，但他对这个问题却没有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，遍数其诗文，除了前文引用那几处简单的提及外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关于方式、方法方面的逻辑表述。缺乏理性指导，这势必会导致实施上的混乱。其次，“任自然”的实现是需要以“越名教”为前提的。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表述结构里隐藏着的一种顺承关系，它决定了须先经过“越”的理性的辨析和弃置，然后才是“任”的感性体认和选择。而嵇康却将之混淆同一了，其做法就是多数情况下都以“任”代“越”了。

我行我素，任情所至。正因为缺少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，嵇康对“名教”的超越也就没有准的可依。一方面嵇康

为人“宽简有大量”，不与世人争名利，味冲淡，王戎说：“与嵇康居二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）而另一方面嵇康却“刚肠疾恶，轻肆直言，遇事便发”。（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）尤其是随着司马氏夺权步伐的推进，嵇康对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实施也就越发走向主观，唯“情”所向。其结果就是一味强调理想而非世俗，进而在思维上形成一种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的二元对立状态，这致使嵇康从此陷于一种情感上的爱恨判别，结果释怀变为了对抗，超越变成了否定。高洁其理想未尝不可（如皇甫谧），但污秽世俗却未必可行，尤其是嵇康在情感上与整个世俗、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，使自己处在政权批判者的立场上，在那样一个暴政的年代，如嵇康这样“越名任心”，取祸也就难免了。

由此可见，否定世俗社会和当权者是嵇康超越观的本质，这样的思想岂能见容于司马政权！

五、结语

对“越名教”的不思辨致使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沦为前后矛盾的“假言”，嵇康没有实现对“名教”的超越，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实现心中的“自然”。王维《与魏居士书》批判嵇康流于小乘：“嵇康，亦云顿缨狂顾，逾思长林而忆丰草。顿缨狂顾，岂与免受维繁有异乎？长林丰草，岂与官署门阙有异乎？”^[12]今日听来仍是深刻。不过，我们在批判嵇康的同时，却也无法否认，正是嵇康不畏强权，坚守着士人心中的那份纯粹和高洁，为了理想行他人所不能行，无论给当时还是后代的士人无疑建造了一座精神的堡垒，那正是三千太学请为师的动人之处。不仅如此，嵇康对庄子的体认，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审美上也开拓了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，虽然那个境界在当时还显得那样朴拙，更甚至于荆棘遍地，但却是我们咏而归的家园。■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余英时. 士与中国文化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: 358、359.
- [2] 戴明扬. 嵇康集校注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62: 138. (《卜疑》篇注载; 《吕氏春秋·节丧篇》: “欲修其葬, 以相矜尚”; 《礼记》注: “矜, 自尊大也。”)
- [3] 陈鼓应. 老子今注今译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3: 55; 《庄子》多处言及“静”、“虚”, 在此不例.
- [4] 罗宗强. 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. 中国社会科学, 1991(2): 147-159.
- [5] 郭庆藩. 庄子集释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: 112.
- [6] 郭绍虞, 罗根泽. 人间词话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2: 191.
- [7] 夏家善. 颜氏家训. 天津: 天津古籍出版社, 1995: 78、96.
- [8] [9] 徐震堉. 世说新语校笺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: 411-412、390-391.
- [10] 唐·房玄龄. 晋书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: 930.
- [11] 鲁迅.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. 而已集.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8: 94.
- [12] 罗宗强.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. 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05: 102.

【作者简介】王世宇(1973-), 男, 辽宁朝阳人,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,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史的研究; 张健(1966-), 女, 辽宁朝阳人,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。

责任编辑: 白沙